



▲人工智能雖然有助提升生產效率，但也可能對就業市場帶來衝擊。

經濟觀察家

人工智能（AI）是當前宏觀經濟討論中的熱門話題，投資於人同樣是當前政策部署中的重要議題。但與人工智能相比，投資於人在投資界和宏觀經濟學界的討論還相對不足。因此，有必要把這兩個議題結合起來討論。

擁抱人工智能 必須投資於人



人口經緯
蔡昉

新質生產力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有望推動中國進入新的經濟周期。這個新周期當然不會是一個含有通縮因素的經濟周期，也不應是一個供強需弱的增長格局。圍繞「十五五」規劃綱要的發展部署，可以從保障合理合意增速、破解生產率悖論、以投資於人分享生產率三個方面理解這一問題。

保障經濟增速合理合意

從2035年發展目標倒推，當前經濟增長速度總體上是合理、合意的。「十五五」規劃面向2035年提出了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雖然並沒有給出這期間及每一年的具體增速，但如果按照這一目標倒推「十五五」、「十六五」期間的增長路徑，每一年的增長速度實際上是存在一個可預測區間的。

按照官方要求，到2035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需要在2020年基礎上按不變價翻一番，預計大約應達到2.2萬美元左右。由此看今後5年，中國經濟每年保持4.4%至4.8%左右的增長速度，即能夠支撐2035年目標的實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經歷了大幅提高的過程。但隨着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中國進入經濟增長新常態，經濟增速下行伴隨的是生產率增速下降。這裏並不是說生產率倒退，而是指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在放緩。從長期軌跡看，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大體呈現倒U型走勢，說明傳統意義上的生產率提升來源正在逐漸減弱。

過去，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來源，是大規模資源重新配置，特別是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提升。隨着人口紅利消失，剩餘勞動力減少，人口轉移速度放緩，這一規模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正在收斂。恰好在一時點上，人工智能提供了顆粒度更小、更精細的資源重新配置機會。未來，人工智能賦能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有可能創造一個新的經濟增長周期。

人工智能提高生產率的重要途徑之一，是更精細更深入的資源重新配置。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質，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說，現有資源配置格局存在不斷優化的空間。每一個市場主體都會在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重新組合，不能實現更好配置的主體可能停滯、退出甚至消亡，而能夠實現更好配置的主體則會生存、發展並取代他人。

人工智能為資源配置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過去，資源配置優化往往需要「試錯」，試錯也意味着浪費。但人工智能可以通過數據、程序、算法和模型，更快地找到更優配置方案。換言之，人工智能有可能減少傳統意義上的試錯成本，直接推動資源配置效率改善。這將為生產率提升帶來更好的結果。

人工智能提高生產率的另一重要途徑，是創造性破壞效應。生產率提

高並不意味着所有主體並駕齊驅。到目前為止，市場機制仍然表現為優勝劣汰，不能更好配置資源的主體會被淘汰。人工智能會強化這種創造性破壞效應。人工智能帶來的創造性必然是前所未有的，但它帶來的破壞性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人工智能時代的生產率提升需要同時關注兩個方面：一方面，要充分釋放人工智能推動生產率顯著提高的潛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可能帶來的就業衝擊、收入分配變化和民生壓力。人工智能發展既是生產率問題，也是民生保障問題。

多途徑破解「生產率悖論」

人工智能時代需要重新理解「（索洛）生產率悖論」。「生產率悖論」最早由經濟學家羅伯特·索羅提出：到處都可以看到計算機，但在生產率統計中卻看不到計算機的貢獻。今天也可能出現類似問題：到處都在談論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效果未必能夠很快在統計中體現出來。

不過，生產率悖論的核心並不在於生產率是否提高。企業採用新技術，通常正是因為新技術能夠提高效率。如果生產率沒有充分表現出來，更可能說明這種提高是不均衡的：有些企業提高很快，有些企業提高有限。比如，中國小微企業佔全部企業的90%以上，如果小微企業遭遇數字鴻溝、智能鴻溝，其生產率提升速度就會較慢。於是，社會上聽到的可能是「到處都有人工智能，卻看不到生產率提高」。

人工智能可能通過「分母效應」加劇就業壓力。勞動生產率可以簡單理解為產出與勞動投入之間的比例。減少勞動投入，勞動生產率就會提高。但如果所有企業都努力減少勞動投入，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會產生合成謬誤，導致宏觀層面就業崗位被替代、被破壞。

近年來，自動化發展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就業破壞效應。每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會提到新增城鎮就業數量，這反映的是就業創造，但它是毛增數，不是淨增數。真正的淨增就業，要看年末城鎮就業人數相對於上一年的變化。淨增就業與新創就業之間的差額，就是被破壞、被替代的就業崗位。目前就業創造仍然大於就業破壞，但兩者之間的比例正在變化，不排除某一時刻出現就業破壞大於就業創造的情形。

從就業軌跡看，比較可能的情况是「J」字型走勢，也就是說，就業可能先經歷一段下行過程，之後隨着整體勞動生產率提高和新產業發展，

再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一定的衝擊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能否最大限度縮短這段時間，盡快進入創造就業的長期軌道上，取決於政策安排和政策效果。

人工智能也可能通過「分子效應」加劇總需求不足。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另一種可能方式，是在不減少勞動投入的情況下增加產出。但如果增加的產出和產能，沒有對應的購買力和需求來消化，供給側大幅擴張而需求側沒有同步擴大，就會形成新的消費不足和總需求不足問題。結合當前討論的供強需弱問題，人工智能既有破解供強需弱的潛力，也有可能進一步放大供強需弱的矛盾。

改善收入分配 促進消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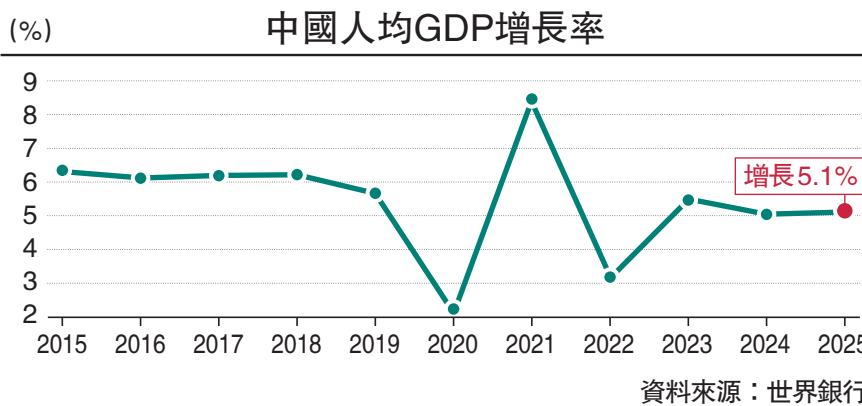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須與勞動生產率的分享緊密結合，這是勞動生產率的一體兩面。生產率提高本身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相應的生產率分享，就無法形成更可持續的消費能力，以支撐生產率繼續增長。實現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分享相互支撐，生產率增長才具有真正的經濟可持續性和社會意義。

改善收入分配是解決購買力不足和消費率偏低的重要條件。當前，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多年來大體停留在0.465左右，高於0.4這一收入差距的臨界水平。這個數值與OECD（經合組織）國家市場收入基尼系數平均水平接近，但OECD國家通過再分配之後，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通常下降約10個百分點，降至0.4以下的水平。作為一種參照，中國通過更大力度的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仍有較大空間。

現代意義上的再分配主要包括兩類手段：一是通過稅收進行調節；二是通過轉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務進行調節，也就要基本公共服務範圍擴大，以及政府社會性支出增長。近年OECD國家經驗表明，稅收改善收入分配的幅度有所縮小，而轉移支付和公共服務改善收入分配的貢獻在加大。對於中國來說，通過兩種方式進行再分配都有很大的潛力，但投資於人可以產生更加立竿見影的效果。

未來仍要依靠投資於人改善收入分配。過去這些年，中國用於投資於人的國民經濟支出佔比有所提高，同時也是基尼系數下降、收入分配改善的過程。未來，要解決購買力不足、消費率偏低以及供強需弱問題，仍然要把投資於人作為重要抓手。投資於人是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破解供強需弱的重要再分配手段。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中企出海新特點及挑戰



曉之以理
劉曉春

中國企業「出海」展現了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新特點，也在全球產業重構中形成了新趨勢、遭遇

了新挑戰。

第一個特點是，一個國家成千上萬的企業短時期內走向世界各個角落。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產業轉移，主要是發達國家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是許多發達國家的企業到發展中國家投資，轉移的目的地相對比較集中。這次中國企業出海，企業數量多，投資規模龐大，不僅有大型企業，更有許多中小企業，甚至個人創業者，出海目的國遍及世界各大洲。

第二個特點是，各行業全方位出海。與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發達國家低端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不同，這一波中國企業出海是各行各業全方位出海，既有低端產業，也有高端產業如新能源汽車、金融科技等；既有製造業，也有如電信類的基礎設施企業，還有如蜜雪冰城之類的餐飲企業，以及電商和科技企業；既有在國內已經非常成熟的企業，也有許多科技初創企業，甚至許多科技類初創企業創業之初就直接出海布局。

第三個特點是，集群式產業鏈出海。中國製造業擁有強大的競爭能力，除了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效率、製造業技術和產業門類齊全優勢外，更重要的是具備無與倫比的產業鏈協同效應。出海企業普遍反映，即使利用國內產業鏈，其生產效率和成本效益也遠遠高於利用當地產業鏈，更何況當地相關產業鏈難以保證完整。有些企業試圖在當地建立產業鏈，但由於文化、員工素質、技術等原因，其協同效率與國內產業鏈相差甚遠。於是，出現了一種全新的出海現象——中國產業鏈集群出海。例如，浙江台州地區企業出海，明顯帶有地區產業特色，是汽摩配（汽車與摩托車零配件）產業鏈集群出海。

第四個特點是，中國企業出海規模龐大，這包括企業數量和投資數量。由於中國經濟體量龐大，這種全方位的出海體量也非常龐大，對於大多數中小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中國企業都是巨大的存在，快速提升了當地的產業層次，但同時可能也會對當地相關行業造成一定壓力。

第五個特點是，中國企業是以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為背景推動產業鏈國際化的。歷史上，都是發達國家的技

術先進企業借助國家發達的經濟、先進的技術乃至強大的軍事實力開疆拓土。因此，所在國政府和人民與這些發達國家的企業和人員處理各種關係時，往往都帶着敬畏的心理。但對中國企業和人員，一些國家，包括一些國家的人民和同行，在歡迎中國企業投資的同時，與看待發達國家企業和人員不同，往往不會以仰視的目光來看待。這在一定程度上會給中國企業在當地的經營和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積極融入當地社會

中國企業出海遭遇的新挑戰則包括：一是，短期內或會給所在地政府和企业造成一定衝擊，中國企業或在當地遭遇挑戰。中國出海企業對目的國的長遠利益是明確而實在的，可以以極低的成本迅速實現工業化和基礎設施現代化，可以獲得質優價廉的商品，迅速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短期也能提高國內生產總值（GDP）和進出口額等。但不可否認，短期而言其可能會給一些國家和地區當下的經濟、企業和利益群體帶來一定衝擊。目前，部分國家對中國企業存在一種矛盾心理。由於各國體制、機制、文化、法律、歷史、風俗等各不相同，不同國家會從自身利益出發，採取不同措施以應對中國企業出海的大趨勢，個別國家或許會採取比較敵對的措施。但相信面對機遇，大多數國家會平衡短期壓力和長期發展。

二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和企業家，或將比發達國家企業跨國經營遭遇更多困難，會有許多意料之外的新型服務需求。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和人民，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和個人，在心理上是仰慕的，有時甚至是懼怕的。但對於溫和的中國企業和中國人，他們大多數是平視，有的甚至是俯視。要求中國企業和企業工作人員必須遵守所在國的法律制度，必須尊重所在國的宗教和習俗，融入當地社會，這些都是對的，但僅僅靠這些，可能並不足以解決上述心理落差問題。這是我們政府、企業和企業家必須正視的一個現象。

由於以上原因，中國出海企業的需求，有許多並不是一般跨國投資、跨國經營所遭遇的問題，西方國家歷史上沒有可供借鑒的成熟經驗和做法，這包括法律顧問和法律保護、企業財產與人身安全保護、跨境投融資、跨境支付結算、跨境財務管理等服務需求。

（作者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 副院長）

庫存漸消化 新盤定價趨進取



樓市智庫
陳永傑

本港上半年一手市場表現強勁，錄得逾1.15萬宗成交，創下自2013年一手住宅銷售新例實施以來的次高水平。踏入下半年，發展商積極部署新一輪推盤大計，除了北部都會區外，九龍區亦成為市場焦點，多個新盤蓄勢待發。

上半年一手成交衝破萬宗，較去年同期的約9330宗上升逾兩成。總成交金額方面，上半年錄得逾1400億元，對比去年同期約830億元，增幅近七成，可謂價量兼備。

發展商下半年仍有多個新盤排隊登場。地政總署資料顯示，截至5月底，市場共有28個住宅樓盤待批預售樓花，涉及9786伙。其中，九龍區比重逾五成，涉及5299伙，牛池灣、啟德、油塘及長沙灣等地區均為未來供應焦點。

眾多焦點新盤中，九龍建業旗下籌備逾20載的牛池灣清水灣道35號（前聖若瑟安老院）重建項目，規模龐大，總樓面面積逾216萬方呎，其中住宅樓面佔近150萬方呎，可提供逾2000伙。項目當年補地價高達96.58億元，

折合每方呎樓面補價4464元，不僅屬市區歷來最貴補地價個案，其定價策略亦將成為後市的重要指標。

受惠於一手交投持續暢旺，自去年2月起已連續16個月錄得逾千宗成交，發展商積壓庫存已顯著下降。隨着去庫存壓力紓緩，發展商推盤定價策略亦見轉變，毋須再採取大幅折讓「以價換量」。

以價換量 轉向改善利潤

預料下半年定價將更趨積極，多傾向以貼市價，甚至略高於市價的水平測試市場承接力，再按首輪銷售反應採取梯級式加價策略，力求在銷售速度與利潤空間之間取得平衡，標誌着一手市場已由上半年「求量」的推盤策略，逐步轉向追求利潤空間的「重價」部署。

受此定價趨勢影響，料下半年市場氣氛雖可維持活躍，惟受制於發展商溢價取態，成交量或難以複製上半年的強勢。昔日發展商高價地、卻被迫低價甚至蝕讓賣樓的「陣痛期」，相信已經過去。

（作者為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本港上半年一手市場成交暢旺，新盤售樓處不時擠滿置業者。